

中日同形词对比以及日语兼类词教学研究

郑卓文

澳门科技大学

DOI:10.12238/jief.v7i6.14977

[摘要] 本研究聚焦于中日同形词的对比分析,旨在优化针对日语兼类词的教学策略,以助力日语为母语的学习者更有效地借助母语优势掌握汉语。尽管中日同形词在书写形式上高度相似,但其语义内涵和语用规则往往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鉴于这一特点,教师有必要在课堂教学环节与练习设计环节持续进行改进,从而切实提升教学成效。

[关键词] 中日同形词; 对比; 兼类词; 教学

中图分类号: G40 **文献标识码:** A

Comparison of Homomorphic Word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and Research on Teaching of Japanese Synonyms

Zhuowen Zheng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Sino-Japanese homographs, aiming to optimize teaching strategies for heterosemic words in Japanese to assist native Japanese speakers in more effectively leveraging their native language advantages when acquiring Chinese. Although Sino-Japanese homographs exhibit high visual similarity in written form, their semantic connotations and pragmatic conventions often demonstrate varying degrees of divergence. Given this characteristic, educators must continually refine both classroom instruction and exercise design to significantly enhance pedagogical outcomes.

[Key words] Sino-Japanese homographs; comparative; heterosemic words; pedagogy

引言

中日两国语言中存在大量书写形式相同或相似的词汇,即“中日同形词”。这一现象为日语母语者学习汉语提供了天然的便利,同时也潜藏着因语义、语用差异而导致的理解与运用偏差的风险。尤其对于日语中的兼类词,其在汉语中的对应形式和使用规则往往不尽相同,成为学习过程中的难点之一。本文旨在深入探究中日同形词,特别是其中涉及日语兼类词部分的异同。本研究聚焦于系统对比分析二者在语义内涵及语用规则层面的差异性,揭示其潜在的迁移影响。基于此对比研究的发现,本文的核心目标在于提出并优化针对日语兼类词的汉语教学策略,着力引导日语母语学习者有效识别并利用其母语的迁移作用,规避负迁移干扰,从而更加精准、高效地掌握相关汉语知识。为实现这一目标,研究将进一步探讨如何在课堂教学内容组织与课后练习设计等关键环节进行针对性改进,以期切实提升面向日语母语学习者的汉语教学效能。

日本最早对中日同形词进行计量分析的是日本政府文化厅,他们在1978年从日本经典教科书中抽取1882个“汉字音读语”为研究对象,以同形词的意义异同作为分类标准,划分出同形同

义词S(Same)、同形类义词O(Overlap)、同形异义词D(Different)以及日语存在但汉语中不存在N(Nothing)的四类词语。国内学者李泉于1991年最早对中日同形词进行数量分析,将3817个中日同形词从词义角度总结出中日相同、中日基本相同、中日完全不同、中日有同有异和汉语有而日语无等五类同形词的数量和占比情况。赵福全在1980年分析中日同形词错译例子,总结出三类错误类型并提出三个解决方法以提高学生学习词汇的效率和准确率。宫岛达夫在1993年从文体特征出发,将中日同形词的文体异同总结为三类。翟东娜在2000年从褒贬义的角度出发,尝试探究同形词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宋春菊在2003年从词性的角度总结出同形词的类型,许雪华在2020年指出词性产生差异的原因。李冰在2008年从语素着眼,统计出中日同素异序词并进行对比分析。施建军、谯燕在2016年通过对译比构建的F-measure为参数,对中日同形词进行分析。

1 中日同形词的比较分析

1.1 字形特征比较

作为词语构成的基本要素,形、音、义三者之中,“形”占据重要地位,这使得中日同形词在视觉特征上呈现相似性。具体

表现形式包括: 字形完全一致、繁简字对应、语言成分互借、语素顺序颠倒以及日式汉字独创等情形。

在中日同形词中, 字形相同的情况相对较为容易识别与把握, 其语速、语序的一致性也能够通过视觉观察得以体现。一般而言, 中日同形词字形一致的现象, 常因日语从汉语中直接引入部分词汇且未作改动所致。例如“正月”“宝石”等风俗、科技、实物、典籍、宗教类词汇, 字形皆完全相同。此外, 在中日两国深入交流的历史进程中, 汉语也借用了日语中的部分词汇且未加改变, 像“寿司”“写真”等。一些早期留日学生将这些“汉字词”引入中国, 并使其得到广泛应用。此两类同形词, 由于基本未经过改造, 因而所表达的意义也未发生改变。中日同形词的字形相同, 使得其词汇含义呈现出相同或相似的情形。比如“一”“两”等表示数量的词汇, “宝石”“孔雀”等表示事物名词的词汇, 以及“高低”等代词词汇等。中日同形词字形的相同, 在日语母语的汉语学习者学习过程中, 往往会带来正迁移效应, 助力他们掌握汉字的书写。

繁简字对应是中日同形词中一个典型现象。其成因主要源于两国汉字系统的不同发展路径。中国的系统性汉字简化始于1956年《汉字简化方案》的颁布, 而日语则主要承袭了更早期的古代汉字字形, 并未受到中国当代简化政策的直接影响, 由此形成了繁简对应的格局。具体表现为两种模式: 第一种是日繁中简, 这是最为普遍的情形。日语中使用的汉字大多保留传统繁体形式, 而中文则采用了相应的简体字。例如“鱼”“务”“伟”。第二种是日简中繁, 此类型虽不常见, 但确实存在。例如, 日语将“佛”简写为“仏”; “片假名”在日语中的标准汉字表记则为“片仮名”。

中日语言成分互借是中日同形词的重要类型之一, 主要表现为双向流动过程中形态特征的增减变化。一种情况是汉语词汇借入日语: 由于汉语属孤立语而日语属黏着语, 日语在吸纳汉语词汇时, 常添加语法标记(如‘大丈夫だ’)。另一种情况是日语词汇借入汉语: 此过程则常伴随形态成分的脱落。例如, 日语动词“打ち消す”(うちけす)在借入汉语后, 简化为“打消”。总体而言, 这类因互借而产生的同形词, 其形态上的差异通常较为显著, 因而相对易于识别和区分。

语素顺序颠倒是中日两种语言中, 词汇组合由相同汉字构成但排列顺序相反。此类词的含义大多依然清晰可辨, 且语义基本一致。例如: 日语的“气运”(きうん)指“形势、气象”, 与汉语“运气”(指机遇或命运)含义迥异; 而汉语的“朴素”则与日语“素朴”(そぼく)意义相同。

日式独创汉字指日本人运用汉字部件创造的特殊汉字形式。这类汉字是日语所独有的, 例如: “虱”(おろし), 用于日本地名, 意指“山风”; “峠”(とうげ), 至今仍在使用, 表示“山巅”。

1.2 语义特征比较

汉语与日语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 从早期的词汇全盘吸纳到后期基于汉语构建自身语言体系, 日语与汉语始终维系着紧密联系。在语义层面, 中日同形词主要呈现三种对应模式: 语义

完全一致、语义完全相异以及语义部分对应。尽管多数情况下语义一致, 但历时演变、地域差异及文化认知模式的不同, 仍可能导致语义分歧的出现。

语义完全一致的同形词主要集中于实物、典籍、科技及概念等领域。实物类如“纸”“笔”等名词, 此类词汇通常伴随实物本身传播至日本, 其书写形式与语义均得以完整保留。典籍类如“学者”, 随中国典籍东传而引入, 对日语汉字体系产生了深远影响, 且语义沿用至今。科技类如“细胞”, 这些词汇为两国科技交流提供了便利, 其语义高度统一, 有力促进了相关领域的发展。

语义完全相异的同形词, 主要源于社会历史的历时变迁、文化风俗的差异以及政治发展路径的分歧等因素。这些因素促使部分汉语词汇在融入日语体系的过程中, 其语义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最终仅存字形关联。典型案例如“大方”“大家”等词汇, 其含义截然不同。因此, 在语言教学与习得实践中, 师生必须对此类词汇予以严格区分。

在中日同形词中, 词义并不总是完全一致。一种情况是汉语中的词义比日语丰富, 以“简单”为例, 在汉语里, 它可表示简单、清晰, 做事草率、不仔细, 很平常等多种含义, 尽管二者同为形容词, 但日语中的“简单”主要取其第一种含义, 即指事物简单、清晰, 便于处理或理解。另一种情况则相反, 日语中的词义比汉语更多样, “反对”在汉语中仅为动词, 表意为不赞同或不认可, 而在日语中, “反对”既可以作为名词, 也可以作为动词或形容词使用, 除了汉语中的意思外, 它还能表示相对或相反的两面, 或是相对或相反的一方。除此之外, 中日同形词还可能存在部分共同义项, 或者双方各自拥有其他独特的义项。

1.3 语用特征比较

中日同形词在具体使用过程中, 因搭配对象的差异, 往往导致其在语用层面形成区别。此类词语通常承载着两个维度的语义色彩: 感情色彩与语体色彩。

在感情色彩方面, 某些同形词在中日两种语言中的褒贬倾向截然不同。例如, “暗算”在汉语中属于贬义词, 指暗中设计害人; 而在日语里, 该词则呈中性, 意指内心演算, 其含义与汉语截然不同。再如“打算”, 汉语中作为动词表示计划(如“打算睡觉”), 作为名词指想法(如“有睡觉的打算”); 但在日语中, 它仅作名词使用且带有贬义, 指斤斤计较或打小算盘。这种语义色彩的显著反差极易对第二语言学习者造成理解偏差。

从语体色彩角度观察, 中日同形词在各自语言体系中的语体特征也存在差异。通过对比口语体与书面语体两种类型可见一斑。以“告诉”为例, 它在汉语中是动词, 表示告知信息; 然而其日语对应词“告诉”, 兼有名词和动词词性, 词义为控告或诉讼。尽管两者在语用功能上存在一定关联性, 但“告诉”在日语中属于书面化的法律术语, 而汉语的“告诉”则常用于日常口语。正是这些细微的语义差别, 直接决定了两种语言中对应词的具体使用场合存在显著差别。因此, 准确掌握此类词语的关键在于辨析其细微的差异。

2 教学建议与对策思考

兼类词教学始终是汉语国际教育领域公认的难点之一。基于前述中日同形词的对比分析可见,面向日语母语学习者的兼类词教学挑战尤为显著。教师应精准预判教学中的重点与难点,充分做好教学准备,并在课堂讲授中着重解析那些易引发偏误的中日同形兼类词。在讲解过程中,应侧重进行中日语言的系统对比,避免直接套用汉语词典释义。直接使用汉语词典解释不仅易诱发学习者产生语用偏误,亦可能徒增其理解障碍。教学还需注重理论讲解与实践应用的结合。建议大量引入生活中的真实实例作为例证,将生词新语置于具体的生活情境中进行阐释。这种情境化教学方式能更有效地促进学生的语言知识内化,从而提升教学目标的达成度。

2.1 优化课堂教学策略

教师在课前准备阶段需进行充分研究,不仅要聚焦目标词汇的同形词特性,还应系统收集并分析学习者偏误语料,预判学生在习得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困难。在此基础上,明确教学重难点,设计针对性讲解方案,以提升课堂教学效能。

教师应当优选教学方法,使教学手段更灵活多样。对于同形同义词,可运用翻译法阐释;针对同形异义词,则宜采用对比分析法,帮助学生清晰辨识其差异。然而,对于同形类义词,若学生尚未出现偏误,应谨慎使用对比法,避免过度强调潜在错误,以防引起混淆、适得其反。

教学实施过程中,教师需密切关注学生的信息反馈,及时调整优化教学策略,以有效达成教学目标。同时,应系统收集课堂生成的偏误语料,据此开发配套教学资源,如中日同形词对比表和对比练习册。此类资源一方面能加深学生印象,另一方面因其语料源于真实学习过程,更具实用性和可接受度,利于学生理解与吸收。

创设良好的课堂互动环境对保障教学效果至关重要。受应试教育传统影响,亚洲学生课堂参与度普遍较低。为改善此状况,

教师可实施预习前置策略,引导学生自主搜集资料并讲解中日同形词,培养其利用词典等工具进行探究性学习的习惯。

2.2 强化练习体系设计

课堂教学时间有限,仅靠课内难以充分巩固知识、获取全面反馈,因此课内外练习的设计尤为关键,需从两方面着手:第一方面是优化教材编写。当前教材多依赖英语注释且未按母语分班,对部分学习者不利。教材应提供多语注释、丰富例句,并考虑母语背景进行词汇分级。第二方面是实施分类练习:针对理解层面的问题,教师需在教学中反复强调关键点,加深学习者印象。设计涵盖理解(如听力、辨析、改错)和运用(如口语、写作、翻译)的多维度分类练习。

综上所述,中日同形词在书写形式上具有一致性,但在语义、语用等层面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受日语母语负迁移以及教材、工具书质量不一等因素影响,准确辨析这些词语面临挑战。因此,亟需从课堂教学策略优化和练习体系科学设计两方面持续改进,方能切实提升教学成效。

[参考文献]

[1]潘钧.中日同形词词义差异原因浅析[J].日语学习与研究,1995(3):21-25,20.

[2]施建军.中日同形词共时比较研究的现状及存在的课题[J].东北亚外语研究,2013,1(1):4-9.

[3]官本幸子.日本学生学习汉语常见的表达错误[J].汉语学习,2000(4):61-63.

[4]阿部慎太郎.日本人的汉字知识——从“常用汉字表”到“新常用汉字表”[J].国际汉语教育,2009(2):49-54.

[5]石原嘉人.「汉字圏の学生にとっての日中同形语习得」[J].琉球大学留学生センター,2012.

作者简介:

郑卓文(2002--),女,汉族,广东省中山市人,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汉语教育。